

坚守在荒寒之路 ——陈衍评传

陈衍，
清末著名诗歌评论家、诗人、学者。
福州人。
他一生不愿当官，好交友、集会赋诗。
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供职，
致力于写诗与诗评，
耕耘于学界与教坛。
著有《石遗室诗话》、《元诗纪事》等，
为人刚直，
坚守在荒寒之路。

福建教育出版社

堅守玄路 寒荒評傳

◎林東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坚守在荒寒之路：陈衍评传/林东源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12
ISBN 7-5334-4564-3

I. 坚 II. 林… III. 陈衍 (1856~1937)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6151 号

坚守在荒寒之路

林东源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福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25 印张 224 千字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34-4564-3/K·119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0591-83726019) 调换。



陈 衍 (1856~1937)

序

陈庆元

已近岁末，盘点一年来写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年初写的《陈衍〈金门洪景星先生墓志铭〉书后》，发表在《炎黄纵横》第五期上。我见到的《金门洪景星先生墓志铭》，系洪景星的后人展示的墓志铭拓本。此文《石遗室文集》不载。也就是我在写那篇短文的同时，东源正在紧张地纂写《坚守在荒寒之路——陈衍评传》的书稿。

东源执教于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我认识东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源是“老三届”中的高中生，恢复高考后考上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调到福建银行学校（后改为今名）。那时我也刚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不久。二十多年前的办学规模比现在小得多，学校少，招生数也少。福建师范大学当时办有夜大学，其中一个班是中文“专升本”的，入学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个班的同学大多是七七或者七八级的专科毕业生。那两年招生、特别是七七级，“大龄”考生尽管成绩优异，本科院校往往不太愿意招收他们，不少“大龄”考生因此就落到专科院校。东源和他的许多同学“专升本”

的背景大抵如此。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有幸给这个班的同学授课，如果不是“文革”的原故，我和他们大概就是前后届的同学罢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班的同学大多发展得不错，有的还担负了相当重要的领导职务，东源则一直在学校教书，并且好多年前已经晋升为副教授了。二十多年间，和东源一直有着来往，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如原来也是任教于南平师专后来调到公安专科学校的张廷泗先生、原来和我同在武夷山任教后来调到银行学校的郑秀清先生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都有比较浓厚的兴趣。

这几年，除了教学，东源还担任了一点行政工作，很忙。尽管如此，东源仍然很刻苦，教学和工作之余，还编写了供金融院校使用的《公文写作》教材，参加了我主编的《大学语文》的编撰工作。东源还前后两次来跟我做高级访问学者，研治福建近代文学。最近的一次，我们商定了《陈衍评传》这样一个题目，作为访学期间的课题。

陈衍（1856～1937），一生著述甚丰。陈衍以《石遗室诗话》名世。《石遗室诗话》已有两个点校本，并且已有多篇的研究论文发表，但不容讳言，目前学界对《石遗室诗话》研究还比较肤浅。在近现代交替之际，陈衍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远非一部《石遗室诗话》所能代表。从旧学来说，他是“同光体”诗派的倡导者和代表诗人；他对经学和史学也有精深的研究。新学方面，他对经济学和金融学也有相当的研究，甚至还有译著。就陈衍的生平而言，论者比较多地看到他是清朝秀才的一面，而较少重视他在张之洞幕府一系列的革新思想。于教育方面，较多议论的是他在无锡国专的情况，很少关注他在京师大学堂和厦门大学执教的业绩。为了能全面地了解陈衍的生平思想以及学术成就、诗歌成就的方方面面，东源对陈衍的研究，采取了评传的方式。因此，

这部《陈衍评传》是一部全景式的对陈衍进行研究和评述的专著。这样的写法，最大的好处是让读者对陈衍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可以消除历来对陈衍的某些误解。东源写这部书，很努力，也很费心血，查阅了不少文献资料，做了大量的笔记，有些章节多次易稿，的确也解决了不少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的见解。当然，评传也有评传的弱点，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评传可能比不上专题研究的论文那样详细，这是评传这种文体使然，而不对作者作过多的苛求。实际上，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对陈衍学术思想的某些评传难于表述或论述的问题，已另用论文的形式进行写作，其中有的论文已经发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阅，或许能起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前几年，到我这儿从事高级访问学者的张帆教授和刘建萍教授，在他们结业的时候，分别完成了《陈宝琛评传》和《诗人何振岱评传》两部著作，随后他们又和闽江学院中文系的同仁们一道编纂了《同光体闽派诗选评》一书，将“同光体”闽派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现在，东源的《陈衍评传》又将出版了，“同光体”闽派的研究又有了新成果出现，为之欣喜。福建近代文学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还有非常之多的课题需要研究，现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有几位博士生正在做这方面的课题，或能弥补某些缺憾。但是我们福建省还很少有专家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整体的研究队伍也还没有完全形成，研究力量也还比较薄弱。不过，我个人对福建近代文学的研究还是抱着乐观态度，相信研究队伍会越来越壮大，成果会出版得越多、越好。期待包括东源在内的同好们一起推动吧！

2006—11—12 于
福州烟台山南麓华庐

目 录

序	陈庆元(1)
引言	(1)
第一章 早年家居(1856~1878)	(17)
第一节 “宝鼎香萦新柏翠,锦屏书映落梅红”	(17)
第二节 “修竹亭亭倚,黄花淡淡姿”	(29)
第三节 “犁然治《说文》,始一以终亥”	(35)
第二章 出游初期(1879~1890)	(39)
第一节 “九曲溪山我旧游,滟淫春雨幔亭舟”	(39)
第二节 “割席华与管”,“安得长相从”	(49)
第三节 “江湖满凫雁,强半稻粱谋”	(61)
第三章 上海八年(1890~1898)	(68)
第一节 “中年倦游畏鞍马,作健犹能止两鞞”	(68)
第二节 “我有元人本事诗,敏夫樊谢是吾师”	(83)
第三节 “嗜学如甘肉,醉心犹饮醇”	(89)
第四章 武汉十年(1898~1907)	(96)
第一节 “君已盟鸥江水湄,我原雁鹭在芦碕”	(96)
第二节 “何为一卷货殖传,手自编排兼补苴”	(121)
第三节 “从此长安真日远,出门惆怅大江横”	(128)

第五章 北京十年(1907~1916)	(140)
第一节 “诗有萌芽意,人多磊訶形”	(140)
第二节 “临颖美人今不见,座中唯有薛华歌”	(160)
第六章 里居修志(1916~1930)	(174)
第一节 “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	(174)
第二节 “横舍高楼壮海滨,重阳风日足清新”	(190)
第三节 “七旬百炼筋骸在,万里三分骨肉亲”	(198)
第四节 “芙蓉红白晓来天,此景依稀卅载前”	(230)
第七章 苏州晚岁(1931~1937)	(237)
第一节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鬓愁”	(237)
第二节 “一幅林山收晚景,数家茶肆息劳生”	(246)
第八章 诗歌与散文创作	(249)
第一节 “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	(249)
第二节 “说子渊渊无尽藏,上薄风骚气独苍”	(252)
第三节 “千言排比铺张易,几字商量妥贴难”	(257)
第四节 “不务雕琢,平淡苍老”	(259)
第九章 《石遗室诗话》	(266)
第一节 “同光二三子,差与古淡会”	(268)
第二节 “雅人深致循良事,都被先生古锦收”	(273)
第三节 “歧而二之,即已误矣”	(278)
后记	(284)

引 言

陈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在文学上他的成就首先是诗论，他编辑、评论诗歌的著作卷帙浩繁，所揭橥的“同光体”诗论对近代诗坛影响巨大。他的诗歌与散文创作内容丰富，形式别具个性，语言时而清苍刻峭，时而清新圆润，熔文学性与哲理性于一炉。然而，由于陈衍是“同光派”的代表诗人，而这一诗派在晚清“众多的诗派诗人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们所诟病”，^[1]所以陈衍长期以来一直未受到研究上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因素使然。时至今日，在我国文坛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片面解读已经逐渐淡化，艺术的个性和自觉意识已受到普遍的尊重，对陈衍的文学活动乃至人生道路进行一番去蔽还真的探讨，重显它的意义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了。

陈衍又是一位朴学家。他经、史、子、集无不淹该，他在治学时循清代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路径，撰写出经学、小学和史学等大量著作。他又将传统的学问与当时随“欧风美雨”一起

传入中国的西学相结合，撰写出《戊戌变法榷议》和《货币论》等近代政治、经济著作，它们既是近代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是在当年提供给当权者作决策时参考的依据。

陈衍还是一位爱国者，他一生光明磊落、清刚劲直、淡泊名利。我们不仅要对他文学、经学、史学、朴学等多方面的学问进行整体上的研究，还要对他进行道德和文章两方面的总体观照，才能避免出现鲁迅先生所批评过的“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的偏颇，力求在研究上对他作出一个全面、公正的把握。

一 道德与文章

仲弓道广扶衰汉，伯玉诗清启盛唐。^[2]

这副对联出自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章太炎之手，是陈衍80岁生日（1935年旧历4月8日）时，章太炎撰送的寿联。仲弓是东汉的陈寔，任太丘长，被党锢之祸牵连，却不逃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后来何进等招他做官，他辞而不就，当时被公认为最有德行的人。伯玉是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的字。此联既是寿联，难免带有旧时奉承的习惯，但作为几十年交往的两位知音，晚年又在苏州谈艺论文，友情老而弥笃，章太炎对陈衍从道德文章两方面进行评价，应该说是十分恰当的。

先说道德。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侯官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而急剧变化的年代。他十分关心政治。据陈衍长子陈声暨编，后由王真续编、叶长青补订的《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

谱》)载,1864年太平天国战乱,福建危急,当时陈衍才9岁,即知道为时局而忧虑。1884年陈衍29岁,中法马江海战在他的家门口爆发,他赋诗讥讽当道者的无能和腐败。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陈衍赋诗谴责当时的“一朝将相”。1898年他支持戊戌变法,上《戊戌变法榷议》一文以向当时的统治者言事。1900年八国联军戕杀陈衍次子陈声渐,陈衍悲愤至极,怒斥昏庸的统治者和残暴的外国侵略者。接下来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在历次重大政治事件面前,陈衍均观点鲜明、立场坚定。但是,他并不直接介入政治,而是有意识地使自己边缘化。他自幼“雅不喜治举业”,一生不愿当官。这一点与陈寔的辞官相同。虽然他也顺从父母长辈们的意愿而与兄长们一样去应试,但每次落选均毫不措意。最典型的一次是1903年,张之洞奏保他应“经济特科人才”试,但因为多年未应试,在文章开头仍按旧格式顶格书写,因而被作为“违式”卷不予送阅。对此次落选,陈衍不悲反喜,认为是塞翁失马。他说:“设不幸而取,又用知县,则吾所固有而不为者也,岂不冤哉。”取是冤,不取反是幸事,这是因为他去应试本身就是“徇广雅之期望,勉强就试”。终其一生,只在1908年至1911年任过3年的学部总务司审定科主事,“官不及五品”。此前张之洞等人多次劝其做官,均被陈衍婉言谢绝。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入刘铭传、张亨嘉、刘麒祥、张之洞等人的幕府,并以执教于新式学堂和主编报刊等方式服务于社会与国家。辛亥革命后基本上是任教于大学,他自己说“自民国,既不为官,绝口不谈政治”。1916年,施愚等人成立“筹安会”,严复参加其中,签名劝进袁世凯称帝,有人强拉陈衍列名其中,被陈衍严词拒绝,断然除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他义愤填膺,赋诗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并捐款慰问十九路军将士。邓晓芒先生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一文中说:

“‘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化’。”^[3]所谓“边缘化”，就是指这类知识分子不直接介入政治，但却从专业的角度对政治进行批判。陈衍正是这样一类从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

和陈衍相比，他的诗友和同人们则大多跻身官场或成为政治风云人物。以“同光派”领袖为例。曾是陈衍最亲密的诗友郑孝胥是个极端，他一生奔竞仕途，“惘惘不甘”，最后竟卖身求荣，当上伪满洲国的“总理”，成为民族的败类。陈衍与他断绝关系，斥他为“丧心病狂”。陈三立跟随父亲陈宝箴投身戊戌变法运动，受到慈禧等人的惩罚，被革职靠边，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沈曾植一生仕途平稳，直到60岁才辞官，还曾赞助康有为办“强学会”，支持改革，清亡后，又于1917年北上参与溥仪复辟之役，事败而归后也以遗老自居。当遗老也是一种政治身份，陈衍就明确反对当遗老。陈衍的另一位诗友易顺鼎，虽没甚政治才能，却极力挤进政治漩涡，科举不顺则靠捐官而至二品虚衔的“贵官”。1900年慈禧西逃，他竟效仿杜甫的“麻鞋见天子”，也“麻鞋赴行在”，危难时刻表忠心，好不容易在1902年才捞到一个官来当。只当了三个月就被罢了官，但仍然向张之洞自呈冤抑，继续捞官当，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还在袁世凯政权中任职。另一位唐宋派诗友樊增祥则是社稷重臣，官位显赫，一直到晚年还充任袁世凯政府的参议院参政。陈衍的老乡、“同光派”的扛鼎诗人陈宝琛青年得志，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黜25年又复出，后当上“帝师”，竟陪伴退位的清帝20年，可谓

愚忠至极。

与上述数人的为官及政治态度相比，可以看出陈衍与他同时代及经历相同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自觉地与官场和政治保持距离，自觉地自我边缘化和自我放逐。按照目前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家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是“放逐者和边缘人”。^[4]如果说，辛亥革命前，陈衍还要依赖于统治阶级，参幕或当了3年的官；那么，辛亥革命以后，他尽量摆脱了对权力和政治的依赖，完成了从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作为这种过渡期的知识分子，陈衍一生坚守于诗歌的美、学问的真和教育的善。

再说文章。虽然他严加删削自己的诗作，但仍然为我们留下了1380余首诗词，他还为我们留下了150多万字的诗论，并撰写了《宋诗精华录》等十多种编辑、评论古代及同时代诗歌的大部头集子，为诗歌及其理论作出重要贡献。陈衍是清末“同光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实际上成为当时诗坛的一位盟主^[5]，对清末民初的诗歌及诗歌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章太炎用伯玉诗的“清”来称誉陈衍，点明了章陈二人的区别。陈衍所代表的“同光派”闽派诗歌的特点就是“清苍幽峭”。^[6]“清”者“寂”也，它的反义词是“喧”。陈衍曾在《何心与诗叙》一文中说自己为诗的特点是不畏“困”与“寂”，走的是一条“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陈衍一生“雅不喜治举业”，不愿为官。他不像章太炎那样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他说自己“位卑身隐”，也就是说，他的人生之路与诗歌之路一样，也是一条“荒寒之路”。他“身丁变《雅》变《风》，以迨于将废将亡”的末世，^[7]却以诗歌与学问的坚守为己任，为我们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他和他所代表的“同光派”诗歌又与南社等团体不同，没有以诗歌为革命服务的明显倾向，“同光派”

接过唐宋“三元”的传统，以学问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俨然走一条追求“纯”艺术的道路、一条以学问传统作为诗歌根柢的道路。

然而，如前所述，“同光体”在晚清“影响最大”却又最受“诟病”。这似乎是个矛盾的说法。我们先说第一方面，之所以发生过最大影响，是因为“同光派”是中国近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陈庆元先生在《论同光派闽派》一文中说“陈衍论‘同光体’的产生，上溯到道光、咸丰中程春海诸人，这是从全国的诗坛来考察的。在笔者看来，‘同光派’闽派的产生，在福建诗歌发展史的历程中也有其内在的原因。”^[8]也就是说，“同光派”诗歌是顺应诗歌发展的产物，它不论是在当时还是身后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那么第二个方面是它为什么受到“诟病”呢？从政治上看，陈衍和“同光派”的其他代表诗人如陈三立等人，虽然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变法，但一旦遭到慈禧的镇压，或退出了政坛，或保持着沉默。他们的表现与革命派截然不同。章太炎曾被关入狱中，却视死如归并含笑与邹容和诗，一个道：“且向东门牵黄狗”，一个说：“头如蓬葆犹遭购”。而陈三立只能摸摸自己的脑袋唱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陈衍则高唱高适的《还山吟》。他们像大多数士人一样，虽然也忧国忧民，但不能像章太炎和也是“同光派”重要诗人的林旭那样为维新变法或蹲牢狱或抛头颅。从诗歌上看，“同光派”的诗歌虽然也有不少忧时爱国的佳作，但他们诗作中的大多数还是歌唱性情、抒写生活的篇章，这便自然不能与“诗界革命”者一样受到“喧”评，而难免为激进派诗人所“诟病”了。

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同光派”诗歌的艺术成就。以陈衍为例，他除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论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文，其中的《石遗室诗话》“文字之浩繁，前无古人，内容也极

为丰富……对近代和现代的旧体诗诗坛影响很大。”^[9]陈衍还编辑、品藻了大量古、近代诗歌，如《元诗纪事》、《宋诗精华录》、《近代诗钞》等，卷帙巨大，评论精细。在现代接受美学看来，鉴赏评论与创作一样都是对艺术的接受。我们可以陈衍对最神往的诗歌之一、高适的《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的接受为例来窥覷陈衍的诗意人生：

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

面对乱糟糟的政治，像陈衍这一类知识分子所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力挽狂澜的效力，那么，陈衍们的“君心”是什么呢？“人生老大须恣意”这一句诗是最好的概括：不愿在官场的泥淖中挣扎，向往超脱，大隐隐于市。这就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喜剧：在遇到挫折时就退居山林。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家的“逍遥”、释家的“出世”联合造就了一条不无美感的出路：“山间偃仰”。我们不妨把陈衍的“山间偃仰”理解成对诗歌与学问的坚守。因为诗歌与学问可以把很浅俗的一件事变得妙趣横生，例如上面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无非就是一句话：“人生如梦”。但是经高适这样的大诗人一点化，则令人拍案叫绝：不是醒时问睡眠时的事，却反其道而行之，是梦中问醒时之事。这种与“梦魂”“相周旋”的意境，马上令我们想起庄子的梦蝶的妙喻：“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

在政治上“穷则独善其身”，转而追求文学的美，陈衍和他的“同光派”因而受到“诟病”。然而，这一流派在艺术上的成就却不容抹杀。我们看到，陈衍循着这样一条“荒寒之路”，“把

宋诗派的理论有力地推进了一步，同时在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最后一个真正的理论家”。^[10]

除了诗歌，陈衍还有一个坚守，那就是学问。陈衍是一位朴学家，他经、史、子、集，无不研究，“取所谓词章考据之学杂治之”，又为我们留下了 150 多万字的学术专著。陈衍治学，能为现实服务，求变求新。戊戌变法之后，废除科举，举国兴学堂、办报纸。陈衍在京师大学堂、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校任教垂 40 年。他又先后任《求是报》、《湖北商务报》、《国学论衡》等报主笔，成为开官智、开民智的硕学名儒。他入张之洞幕府 10 年，为张圆“中体西用”之梦理财，著、译了大量金融、经济著作。

陈衍曾对他的学生黄曾樾说：“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犹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否则虽工不到什么地步去。”^[11]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钱仲联先生曾有这样的评论：“郑陈又领袖闽派诗坛，达数十年之久。海藏（郑孝胥）晚而叛国，而先生以德高独尊。所著《石遗室诗话》正续编、《近代诗钞》二十四册，煌煌巨帙，声教远暨海内外，一时豪俊，奔趋其旗纛之下。”^[12]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道德文章天下事”。在他的 80 岁寿筵上还有一位祝寿者选择了和他相近的人生道路，这位祝寿者就是钱钟书，他对陈衍的“志行学问”同样给以很高的评价：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日，石遗丈八十生辰，置酒苏州胭脂桥寓庐，予登堂拜寿。席散告别，丈恍然曰：“子将西渡，予欲南归，残年远道，恐此生无复见期。”余以金石之坚，松柏之寿，善颂善祷。丈亦意解。是年冬，余在牛津，丈寄诗来，有“青眼高歌久，于君慰已奢”等语，余复书谢。以后音讯遂疏。二十六年夏，得许大千信，则丈以疝气卒矣。